

目 录

陶铸同志是领导统战工作的好榜样.....	罗培元 (1)
回忆陈郁同志.....	张 报 (18)
爱国侨领司徒美堂的抗日救国活动.....	张兴汉 (24)
著名考古学家容庚.....	张维持 (35)
博学旁通的历史学家岑仲勉.....	区庆芝 (51)
记历史学家张荫麟.....	谢文通 (55)
青山隐隐水迢迢.....	李小松 (60)
——记宋史学家张家驹	
体坛英杰徐亨.....	秋 帆 (67)
排坛忆往.....	刘权达 (74)
半个世纪前的一位泳坛明星.....	采 文 (83)
——记南国美人鱼杨秀琼	
石湾陶塑三大名家之一陈渭岩.....	邹 华 (93)
湾江才人.....	陈玲玲 (104)
——记陶瓷工艺大师刘传	
刘传大师与石湾陶艺.....	于 逢 (110)

一代乘驼 普天树植.....梁 雄 (119)

——古今十大著名林学家之一沈鹏飞教授

我与麦华三.....秦庆钧 (127)

✓当代词学家詹安泰 (两篇).....汤 肇 民 (135)

作家辛雷的历程.....徐 亮 (143)

盛德宜扬.....韩子西 (153)

——忆鉴藏家杨铨

黄梁纪梦录.....秦庆钧 (159)

——我在抗日战争后期任平远县长的回忆

关于《行刺孚琦、李准、凤山亲历记》

一文几点质疑.....严昌洪 陶季邑 (210)

后 记.....编 者 (220)

陶铸同志是领导统战工作的好榜样

罗 培 元

“文革”前，陶铸同志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华南分局和广东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他十分重视统战工作，作出很多重要决定，采取很多有力措施来团结广大党外人士，取得很大成绩。不论党内党外的同志都认为他在这方面的领导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特别是在他工作重点所在地广州地区的统战工作方面，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长期以来在广州从事统战工作，在他直接间接的领导和影响下，受到很大启发，得到许多教益。当然，陶铸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也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和做法，要是他还在世的话，我想也会总结出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来的。这里仅就他在统战工作实践中证明了是正确的、成功的主要方面，就我所知所接触到的事作些追忆，对一位党的领导同志的一个好传统，加以传述。可惜我只能就我所接触到的和追忆所及的写出来，挂一漏万是难免的。

一

不论在党内党外，或公或私的接触中，陶铸同志同我们谈及统战工作，谈到要团结好党外人士时，我们总深深感到他始终站在党的政策的立场，出以公心，本着至诚尊重党外人士，更没有敷衍应付的一套。他要求我们努力做好统战工作，是十分真诚的。他之所以能如此，我以为这是与他深刻领会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又将这些理论同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分不开的。毛泽东思想中关于

统一战线的理论宝库，真可谓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陶铸对党外人士谈话和对党内进行统战政策思想教育中，常常提到毛主席的有关言论，固然不用说了，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中，他针对一些持有“左”倾思想的同志的另一种看法，即：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没有讲及搞公私合营，没有讲到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结成联盟；这就是说，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团结和安排工商业者的统一战线，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根据。陶铸听了这些反映时，愤然作色，说这些人根本没有读马列的书，乱说一通，列宁不就是说了许多关于赎买政策的话吗？不消灭资产阶级，不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违反马列主义，和平改造破坏极少，这是中国历史条件下最好的办法。他还说，你叫他们从头到尾翻一翻马恩列斯的著作吧，如果谁能找出马恩列斯讲到无产阶级革命不要同盟者的话，我这个书记就不当了，让他来当。他还说，这些人连《共产党宣言》也不读，象什么共产党员？他鉴于此，指出党校一定要讲统一战线这一课，还说：这个时候特别要讲明中国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是有功劳的，解放后买公债、接受改造，都是好的一面，和平改造完全可能。要改造某些同志对我国工商业者的看法，省、市统战部的负责同志首先就要去党校结合实际地讲，也要对工商界讲一讲，让大家接受改造更有信心。也许是由于陶铸对各方面有所交代，后来不仅党校要统战部的负责人去讲统战工作，大专院校以至部队也要我们去讲统战工作，报刊和广播电台也对统战工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进行广泛的宣传。这对于促进全党动员做统战工作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陶铸同志还用自己切身的体会，生动地形象地说明统一战线的重要。他对党外党内的同志都不只一次说过，过去我们在苏区搞革命时，由于执行王明一套“左”的路线，没收资本家——实际上更多的是小商人小业主的一切财产，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把他们当敌人来打倒，以致商品流通渠道堵塞，经济衰落，

苏区常常连盐也没有得吃，穿、用的更少。那时战士有一句很象形的话，“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陶铸说，现在许多老红军老干部对此记忆犹新，许多人由此受到教训，得出要做统战工作的结论，可惜有些人至今没有接受这个教训。陶铸说，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战争年代的战士和干部，从延安到全国解放，由于有一个统一战线这个“法宝”起作用，没有尝过不要统一战线而“天天吃南瓜”的苦头，所以一般说来，现在公开讲不要统一战线的言论不多，但不重视倒是较普遍的，尤其是不尊重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力量这种思想十分普遍，许多人以为只靠军事和政治工作一套便可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可以打败蒋介石，搞建设就不在话下，只要有共产党的政治工作就行，这也是十分不对的。我至少听陶铸讲过三次这样一个有趣的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他说，我们的邓子恢同志有个炊事员，很多时候把饭煮焦了，邓老对炊事员多次提了意见而不见改，就认真地批评了几句，炊事员反而振振有词的回答说：“你还要我做些什么？我总不会放毒在饭里给你吃。”陶铸说，这个炊事员的全部认识是，他只要凭恃着“政治可靠”这一点就可以当首长的炊事员，至于饭煮得好不好，全不在乎。这种思想在我们相当一部分干部中从另一种形态表现出来，就是认为只要政治思想正确，有政治工作的本领就行，就可以担当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大事业的领导。这是非常错误的。不懂得建设时期的事业和过去时期的事业不同，建设事业的政治领导，也和过去动员人民分田分地打土豪，吃小米扛步枪不同，不只需要大批有知识，有专业技能的科学技术人才，而且还要依靠他们来搞好建设。陶铸正是从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来对待统战工作的。

陶铸同志历来把广东尤其是广州地区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来看待的。他十分重视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共同把广东的统战工作做好。他在党内许多重要会议上反复讲过，广东这个省份资本主义发展较早，工商业较发达，又是孙中山的故乡，民主革命

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发源地，民主人士多，老朋友多，民主党派多，知识分子多，加上毗邻港澳，港澳同胞90%以上是广东人，海外侨胞特别多，集这么多特点于一地是全国所没有的。所以广东的统战工作特别重要，作得好，不但广东工作顺利，对全局以至海外的影响都很大。他常常强调要全党动手做好广东的统战工作。一次，当他和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同我在一起时，就反复讲了这番道理，要我们专职做统战工作的统战部长“十分重视这一点”。他同党外人士会见时，也常常说到广东是个重要的地方，对内外影响都很大，希望他们多提意见，共同努力把广东的事情办好，特别请他们对统战工作多提意见，随时电告他约谈或由统战部长转知。还说，搞好广东的统战工作，是大家共同的责任，统战部工作做得有不妥之处，请多加批评、帮助。

陶铸同志每年都有许多机会和党外人士见面，在越秀山体育场、在中山纪念堂、省府礼堂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见面或讲话。而凡是在这种场合讲起话来，他多数会亲切地提到党外人士和统战方面的事情，使党外人士感到十分亲切。陶铸每年至少有两三次同省、市党外民主人士、教育界、科学技术界、文化艺术界人士举行恳切的座谈。他向党外人士通传我们党和国家以及全省的重大事件，大政方针，工作任务，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对港澳同胞的上层人士也如此。在省举行的重要会议上或逢全国人大、政协开会党外人士经过广州时，他总是要约集他们中的高层人士举行座谈会的。这些座谈会有时和省、市党外人士合起来开，有时分别来开，规模大中小都有，有时是三两人清茶一杯，促膝谈心。省市的有关负责同志如陈郁、林李明、区梦觉、刘田夫、王德等同志和省、市的统战部长都参加。会上照例是陶铸先通传情况，然后举行座谈，征求意见，对一些意见，往往马上作出答复或要有关部门查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会后往往把陶铸的讲话（除限制传达范围的以外）向各自的成员传达。所以民主党派成员和工商界人士至今对此念念不

忘，说陶铸在广东时好象和我们相处很近，隔不多久就可以听到陶铸同志的声音。六十年代初，陶铸还约请中南五省的和港澳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到从化温泉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联欢会，还让我们陪他们到各地去参观游览。1965年，陶铸指示在广州办了一次“中南戏剧汇演”，他和中南地区的文化艺术界人士在白云山举行了座谈会，在交流意见中谈笑风生，中南各省的文化界人士都感到中南局的领导对他们十分关怀、十分亲切。陶铸就是这样主动接近党外人士，广交朋友，做好统战工作的。

二

陶铸同志狠抓解决具体问题来体现统战政策，在重大的事情上总是亲历亲为，从来不讲空话。

对党外人士的工作安排和政治安排，是一项特别需要慎重对待的工作。抓好这方面的工作，才有利于加强团结、安定情绪，调动积极性和产生良好的影响。毫无疑问，陶铸同志在这方面干得特别有胆有识。“文革”前，先后安排了副省长8人（最多的一届安排4人），副市长8人（最多一届5人）；省政府的正厅局长10人，副厅长31人；市政府的正局长4人，副局长24人。省、市政协的副主席安排得更多一些。陶铸特别注重安排那些对台湾、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有影响的人士，象李章达、陈汝棠、陈其尤、李民欣、李朗如、邓文钊、黄洁、郭棣活、黄长水、蚁美厚等都是；还有知识界，如许崇清、萧隽英、丁颖、张瑞权、谢志光、冯秉铨等。据我所知，广东省和广州市，是全国各省、市中安排这一级的党外人士最多的地方之一。在政府委员（后来的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中，党外人士的比例一直是大的。在安排党外人士的过程中，党内有些同志有意见，要同党外人士比，陶铸批评这些同志“缺少起码的共产党员的风格”。

陶铸既十分重视党外人士的安排，又要求省、市统战部门要

使担任实职的党外人士做到有职有权。对签发公文、主持和参加会议以及看文件等方面作出规定并检查其执行情况，以利于发挥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他特别注意到改善大专院校和中学的党委（支部）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存在的问题；他还设想到在中学实行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问题。陶铸说，他的这些意见，许多学校的领导接受不了，有一位中学教员说，这是朱可夫的做法，要反映给中央，中央不同意，他就退党云云。可见文教的领导要同学校的同志讲一讲：要人家当校长，又不给人家权力，怎么行？陶铸又说，党外的同志也要争，不是争权夺利，而是争工作权力，工作机会。陶铸讲这番话的目的，都是为了探索出一条改善党的领导，做到校长有职有权，以利于团结广大教育界人士，共同把党的教育事业办好。

在1956年，陶铸同志和省市统战部门都收到了好些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来信，要求给以生活出路、安排工作，陶铸感到这不是极少数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就应该安排他们的工作，解决生活出路问题。他说，统战部门应该主动为党委考虑和做好这件事。他亲自交代省市统战部进一步摸查估计，看看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人，提出统筹安排的意见。经过摸查估计，仅在广州地区就有好几百人。陶铸指示由省、市政协出面，对尚未就业的知识分子进行登记，结果，共登记了1000多人。登记后，先由省、市政协分头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策四个月，然后分配工作。由省市教育单位安排工作的200多人；其他的人由省、市文史馆、省、市参事室及政协机关、民主党派机关分别安排一批；由省、市劳动部门安排一批。对于那些年老体弱或不宜工作的，也分别给以一定的生活补助。这样，社会上未就业的知识分子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这事不只是受到安排的人皆大欢喜，在社会上，包括对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的影响，也是很好的。

陶铸同志在1955年三大改造高潮前夕，亲自在党内外宣讲了

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的主要政策，如全行业合营、定息、高薪不变以及人事安排和成立专业公司等。他亲自召集省、市工商界头面人物的座谈会（当时也请主持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叶剑英同志参加），要求全省工商业者响应毛主席提出的掌握自己命运的号召。他反复讲明和平改造政策好，并当场出了“安民告示”：“一不杀，二不斗，三不吃官司，还安排工作，有选举票，有薪水拿。”他当场要在场的省、市委书记表态。李明同志即刻说：陶铸同志讲的，本人在岗位上坚决执行；王德同志除了作同样表态外，还说：会上大家提到的五反遗留下来的处分要予减轻，工资太低的要调整。这个会始终保持团结、乐观、恳切的气氛，对于接踵而来的敲锣打鼓接受改造局面的出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陶铸同志在团结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积极作用这个问题上，曾采取了许多被认为是有胆有识的措施。他十分重视高等院校，重视人才培养。他常说要办好高等院校，首先要团结好高级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他每年都要到中山大学等院校一二次，每年接待专家教授座谈两次，他风趣地说历来对死了的孔夫子还“春秋二祭”，对活着的“夫子”一年也要拜望两次。他到各校了解师生生活情况、工作和学习条件以及教学科研方面的问题，随时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他还经常约请院校党委书记到他家里商量学校应兴应革的事情，要求校党委负责人要注意改善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办好学校。陶铸十分重视复办暨南大学，他认为在广东这样一个接近港澳、海外华侨众多的地方，把暨南大学在广州复办起来，对团结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培育他们的后代，有深远的作用。在他的直接关怀下，建立起了包括荣毅仁等内地和港澳海外知名人士的校董会，积极筹备复校。他责成中山大学党委负责人黄煊秋，要中大负责配备暨大各科室的人选，保证质量，将中大原先打算自办的经济系所配备的力量，连人带马交给暨大。暨大筹办于1957年，次年9月便开学，这是陶铸同志亲自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的结果。初时陶铸兼任暨

大校长，后来不兼了，还每年到暨大视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陶铸同志亲自过问党外人士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一次，当他听到统战部反映说，党内有些同志认为统战部门要求有关方面改善党外人士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是右倾。陶铸说，就是要你们能反映问题，包括待遇问题，不然要统战部干什么？陶铸也知道光是统战部叫，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所以许多事情他亲自过问，亲自解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52年，当他看见当时的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广州市副市长李章达和卫生厅厅长陈汝棠住房条件不那么好时，他批评了省统战部负责同志。后来他知道陈汝棠是另安排了房子他不愿意搬，李章达是舍不得离开祖居，他才没有意见，但他仍一再要省、市统战部经常关心这方面的事。他还一一问清了上层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在开会、上班时的坐车问题以及看文件等问题。当他听到由于车少，有些厅局长上班开会有时坐不上车时，他问，我们的党员厅局长有没有这种情况？还说，挤不下，党员就让吧，这才算共产党员嘛。陶铸对教育界、科学界和文艺界的工作生活条件尤为关心。大家知道，人民北路湖边新村的十几幢专供音乐界、画家住用的宿舍，是他听了“鸣”“放”出来的呼声后，亲自指示朱光市长要盖的，据说他还看过图纸。他到大专院校检查工作时，多数是先看膳堂、宿舍，指示院校领导要搞好食堂、要多盖教授、教师宿舍，要求他们的宿舍要有能放下许多用书，便于著述的地方。他视察中大时知道陈寅恪老先生住房小，书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马上通知学校解决；1960年，陈老在浴室滑倒，跌断腿骨，陶铸专程到中大看望，要学校指派两名护士专门照料陈老；陶铸知道陈老双目失明，看不了报，又爱听京戏，他特地为此送了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飞利浦收音机到陈老家里。有个别党员负责人对此不满意，说陶铸这样做太过分了。陶铸知道了干脆说：“你那位共产党员有陈寅恪这样的好学问，我也同样照顾你。”陶铸听说著名数学家姜立夫教授要求充实数学

系图书期刊，需款4万元，就马上连同外汇指标批准了，让姜教授支配使用。这些事一时传为美谈，在海外的知识界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五十年代省、市政协的房子都不好，又不够用，他拨款给省政协盖了新房子，又将沙面至今还是最好最大的一座花园洋房给市政协使用。这事不是我们要求于他才这样做的，所以市委书记王德同志告诉我们这个“喜讯”时，我们才知道那是陶铸下的决心，党外人士对此非常感动。

六十年代初在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陶铸同志特别强调要做好雪中送炭的工作，宁可我们吃少些，也要让党外人士过得稍为好一些。他作出一个对党外各界人士（含知识界、文化艺术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人士）约2000人实行分级特供的指示，要广州市负责保证物资供应，还给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上层民主人士每月发几张餐券，持券人可带家人到指定的几家餐馆吃按牌价供应的猪、牛、鱼及三鸟的菜色。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王德同志也感到要实现这计划难度不小，但是王德还是把任务担当起来，要省、市统战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出分级特供的名单，然后计算所需的肉、鱼、油、米、鸡、鹅、鸭、面的需要量，找财贸部门的同志联合开会解决。王德亲自主持了几次会议，由于特供需要量太大，粥少僧多，大家——尤其是搞财贸的同志一时给吓得瞠目结舌。但是，王德还是要求大家坚决按陶铸的计划办，他把市本身不能解决的特供缺口电话报告陶铸，马上得到支持解决的答复。这总算把这问题解决了。但陶铸还怕不落实，亲自找王德和省、市统战部长、财贸部门负责人同志开会，逐项检查。他又担心不落实到人，落实到人了又怕打了折扣。他要省、市统战部长亲自到供应单位检查，对于那些没有享受特供待遇或享受不多的党外人士，他也要我们多做些思想工作，还说，“没物质，搞点精神也好嘛，对于文史馆员送点文房四宝也好嘛。”他听说广州酒家的大师傅能巧手制作蕃薯宴，他说：“需要招待党外人士，没点心，没肉菜，蕃薯宴也好嘛。”他还将原中苏友好大厦，现交易

会几大片房子交给省、市政协搞俱乐部，要我们定期多开些联络感情的舞会、音乐演唱会，下棋，谈心，清茶一杯，冰棒一条。后来知道弄冰棒、雪糕没糖，陶铸同志也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了。陶铸听到石牌几间院校的教师反映买东西困难，他就亲自约请市长曾生和省、市有关负责同志到暨大开会，决定在马岗顶建百货大楼和菜市场。在经济生活困难时期，建成石牌市场是不容易的，由于陶铸检查督促得紧，不到一年就建成了。

陶铸同志体会到中央一级党外人士也遇到类似生活困难的问题，他向中央提出在1962年邀请百多位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来广东避避寒。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叔通和居住上海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俞振飞夫妇等知名人士都来了，全体都安排住在东方宾馆，按宾客标准招待。除了在广州市及肇庆等地参观之外，还专机送一批客人到海南岛、湛江市参观。当时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供应还是相当困难的，但广东在这方面分担了中央的一点点困难，对全局的统战工作，是作出贡献的。由于我们省市的统战部长被派参加作联络接待工作，交上许多新的朋友。后来到北京开会，许多接受过招待的人不管识与不识，都主动找我们谈谈他们南游这难忘的事，还要求我们向省、市委领导转致谢意。

三

陶铸同志十分注意掌握思想改造的政策界限，充分估计到党外人士的进步和爱国思想。“文革”前一段时间，党内固然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在党外人士中搞的运动也相当多。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扩大化固然不用说了。在思想改造中，挫伤的人也不少。陶铸也意识到这对团结广大党外人士——特别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十分不利，可是在当时条件下，他也只能做他所能做到的。他向王德同志表示同意市委统战部提出的多摘早摘“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意见，还及时同意熄灭了把反右倾运动扩及党外的火苗。陶铸教

我们，不要老抓人家一点错误不放，摘了帽，有人还叫人家“摘帽右派”是毫无道理的。没有本事的人才象唐三藏那样，老用紧箍咒来对付孙悟空，老拿帽子来压人家，人家是不服气的，到头来国家要吃苦头的。陶铸要我们对党外人士和知识界的思想教育要抓紧，但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动不动就批斗人家。他很尊重中大党委书记冯乃超同志，认为他不老是搞“左”的一套，一有机会就整人，而是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在文教界中有相当高的威信。因此他提议任命冯为高教党委书记，对高等院校不善于做团结知识分子工作和思想工作的人，陶铸下决心一一进行调整。他强调思想改造不是几次运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要做长期的工作，只要求大家爱国，不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就好，过高要求会脱离实际，反而不易见效。他要让党外人士多到下面去看，看好的也看差的，看到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批评不对不准，也不要紧，闻者足戒嘛，共产党员要有这点容人雅量，批评对的，利于改进工作，这样就会使人对共产党心悦诚服。一次，他在同党外人士开座谈会时讲到，东江发大水，一时间灾民没房子住，民主人士提出批评了，不久，我们及时盖了许多新房子，安排好灾民，有“灾痕不见见新村”的诗为证云云。这样一来，批评最凶的人也没有意见了。陶铸同志最不同意一些同志老纠缠在人家一些无关重要的思想意识上，甚至在心理上的细微末节问题上说长道短。他听到反映说，著名粤剧演员马师曾怕雷公，雨季打雷多时竟然要住到爱群大厦去避雷，言下之意，颇不谓然。陶铸批评说，这是吃饱饭没事干，人家怕雷公干你甚事？有什么好讲的？在雷区谁不有这个怕？不是有许多自命为唯物主义者共产党员也怕鬼吗？

在各种思想改造运动中，陶铸同志是极力保护党外人士中的“高、老、大”的，即对于高级民主人士，老朋友，大知识分子，纵然在当时运动的要求，他们有些出格的言论行动，也总是抱等待、耐心说服的态度。每次运动当头，他都先对党委打个招呼，对一

这些人不要去触动、惊动他们，不要看人家不是天天把拥护共产党的话挂在嘴边，就以为人家不爱国、不热爱社会主义。有时他亲自当众打这种招呼，例如，在一次运动当头的时候，他对高级知识分子讲话，就当众讲“坐在前面的几位（指的是丁颖、陈焕镛、罗明燏等几位）都是没问题的”，为这些他称为“国宝”的大知识分子先写下保票。“文革”前，欧阳山同志的《三家巷》受了批评，报上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他很恼火，曾公开说过“这样天天批，有什么味道”？当然，那怕运动当头，如果形势许可，他也尽保护之责的。记得在批《三家巷》高潮时，陶铸在省人代会上讲，现在大家都在批《三家巷》，原先周扬同志说欧阳山写得好，现在大家说不好，有错误改了就好嘛。耳灵的人听得出，陶铸这番话是明批暗保。他对许多问题的是非界限，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或专门召开打招呼的会议向党外人士坦率讲清楚，他也非常坦率地对党外人士讲，欢迎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有意见当面讲最好，曲达也欢迎，背后嚼娘就不好。

陶铸要我们对党外各界人士，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作出充分的估计。五十年代中期三大改造高潮中，陶铸对工商界响应党中央全行业合营的号召，敲锣打鼓接受改造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在会上说，省、市工商界掌握自己的命运，带了好头，带动了全省工商业者，这是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1960年，毛主席说，民主党派大有进步，知识界大有进步，工商界大有进步。对这个评价，党内有些同志接受不了，说是估计太高了，有的人还这样问：“他们大有进步，共产党的进步，该怎样讲法？”陶铸说，这样讲法和这样提问题都是十分不对的。1962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上，周恩来、陈毅同志都给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建国十二年的转变，给予肯定，指出是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陶铸支持这个看法，明确指出：“目前我国知识分子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这里所讲的根本变化，就是指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到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转变，后来人

们称广州会议是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会议，即脱了“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加了“劳动人民”的冕。中央肯定了这个转变，指出肯定这个转变对于团结全国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来由于“左”的一套的影响，广州会议这个对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正确估计，很快就给波及全国的四清运动抵消了。陶铸曾在许多党内外会议、座谈会、报告会上都一再讲：人家跟你共产党干社会主义，还受到七整八整，又挨过三年没吃过猪肉的苦头，还一样积极工作，积极教学研究，积极演戏，这不是“大有进步”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专道路”这些提法，都应该取消。六十年代初，他在温泉就对粤剧界人士说，你们爱国做了这么多工作，经过了这么多考验，都是老革命了。对港澳人士的进步，他也作了充分的估计。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港澳的代表人士看见我们三年不吃猪肉，也无改于爱国和相信党、相信社会主义之道，不也是“大有进步”吗？陶铸以这些风趣的话来表达他对党外人士的看法，往往博得满堂掌声。

四

良好的作风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一个重要保证，陶铸同志是深得此中三味的。

陶铸十分注意广泛联系党外人士，还亲自上门交朋友。1952年冬，我初到广州，陶铸同志叫我到他家谈话，交代任务完毕，他问我熟悉不熟悉广东民主人士，我说解放前我在香港分局当统战委员时，经常和当时滞留在香港的高层民主人士联络，他们大多数人的家门我都上过。他说这样好，让我们约好饶彰风同志一道登门拜访。言出行随，不几天他带我们先后去李章达、陈汝棠、陈其尤、张耀村、萧楚英、秦元邦等高级民主人士家里坐谈（知识界的他约管文教的同志一道去）。见面过程中陶铸同志都虚心请他们对广东的工作提意见，要求他们支持统战部的工作。他要我

们多上党外人士的门，他问饶彰风，你刚才为什么把陈汝棠的门牌记错呢？统战部长应多串这些老人家的门嘛（按：原来饶是陈汝棠家的常客，只因为临时出来，他同陶铸同车，开车的不是饶彰风的老司机，车不对门，一下子叫错了门）。以后，陶铸怎样串民主人士的门我不得而知，但据高等院校的领导同志说，陶铸很多时候去串教授、高级文化知识分子的门。他还常常交代说，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首先要做到尊师，每年至少应该上教授们的门两次。如前所说，陶铸是经常和党外人士开座谈会和作报告的，他常常谈笑风生的谈及党外人士的一些工作上以及私人生活的趣味隽永的雅事，使人们感到十分亲切。陶铸后来任国务院副总理，澳门知名人士何贤先生说：可喜的是北京有了个陶老总，可惜的是广东少了个陶书记。

陶铸同志不是为交朋友而交朋友，而是在交朋友过程中做到了解人和关心人。比如象前面提到的，当他晓得一些作家、画家、音乐家连工作室都没有，便要朱光划地盖了十几幢房子的湖边新村。当他家访中知道一些作家、演员住房不好，又在大沙头指拨了一批房子，解决他们的问题。原工学院院长罗明燏逢人都说：“知我者其谁？前有伯南（陈济棠），后有陶铸。”陶铸知道马师曾盖房子少了几千块钱，便通知有关部门给他减轻一些费用。陶铸同志知道名画家关山月工作条件还差，就给他送文房四宝，还声明是自己掏腰包送的。遇上有好的京剧演出，陶铸往往派车把爱听京剧的陈寅恪教授接到剧院与陈教授一起听戏。这一切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使许多党外人士觉得陶铸同志不只是一个好领导，还是一个关心自己的朋友。党外人士觉得陶铸同志这样好作风是党领导的一股暖流，这股暖流是一种十分有力量的鼓励。正如罗明燏所讲，陶铸知道他能干什么，也知道他的性格，常常突然派他任务，想到他历来关心自己，总有感恩图报之心，要他晚上动身，决不等到明早。大家知道，著名的外科专家邝公道的高明的接骨技术和先进事迹，陶铸比我们许多人都了解得更清楚，他力

主表彰那些有专长的专家，肯定他们的成就，鼓励他们进步，多作贡献。在许多座谈会上，他表彰的好些专家、学者的先进事迹，我们专职做统战工作的，也未必比他知道得多，了解得细。

陶铸同志在同党外人士座谈或作报告中，对我们党同政府的工作中的失误和没有做好的事，也常常做坦率的自我批评。他谈得较多的是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和浮夸风、共产风的错误。他对当年流行的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对他自己提的“放开肚皮吃饭”等错误口号，都作了自我检讨；对由于大跃进和吃大锅饭造成的三年经济生活困难，苦了老百姓，死了许多人，都公开作过检讨。他常常风趣地说，公和祥机器厂说制造飞机，你纵使能做得出来，我陶铸也不敢坐。就是对于党外人士反映较多的土改和历次运动中华侨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问题，他也多次有过检讨的话，想努力抓好侨务工作来补救。这些自省自责的做法较易取得党外人士的谅解，他这样做不但没有损害党的领导威信，恰恰是令人更信赖党的领导，提高了党的威信。

陶铸同志是党委的书记。我们专门作统战部工作的，总觉得他在抓统战工作方面，不仅言传身教，而且总是走在我们统战部的前面，在大政方针方面固然不用我们向他传达什么，提出什么，更不用说要向他“宣传”（中央领导曾要求统战部长善于向党委书记宣传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要做什么了；相反，倒是他对一切重大问题都是心中有数，常常是主动通知市委书记，通知省、市统战部门，要我们干这干那，他了解政策，熟悉情况，对党外人士讲话，从来不要别人帮他起稿，只是对某些具体问题，他才问一问统战部门，要部门先作调查，先提意见。他断事疾，从不含糊其词，做事更讲效率，雷厉风行。例如大事如上面提到的登记、安排未就业的分子和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经济生活极度困难时，给广州地区的2000多党外人士以不同级别的特需供应，以及他把沙面英领馆的房子给市政协使用等等，都是说办就办，说给就给，说搬就搬，干脆利落，毫无拖泥带水之处。我们市政协